



文化茶座

子弹库帛书归来的多重意义

■ 刘冬梅

何为子弹库帛书

子弹库帛书也叫楚帛书,是目前出土的唯一的一的战国时期帛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之首”,是中国神话、天文学与创世神话的“活化石”,也是中国最早的带有数学性质的特殊作品。

该帛书以丝帛为书写载体,在这块长47厘米、宽38.7厘米的丝帛上,有文字三篇,图像多幅,且结构特殊,帛书中部的两篇文字,一篇正写,一篇倒书,分别为八行和十三行,文字四周每边有三幅彩图,计十二幅,每图均配有文字。该帛书以楚系文字书写900余字,按内容分三卷,分别为第一卷《四时令》、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

第一卷《四时令》记载了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生四子开辟天地,四子掌管四季的故事;炎帝祝融“奠三天四极”、共工制定历法的传说。可以说,这是“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其叙事融合了楚地巫文化与中原五行思想,颠覆了《山海经》等传世文献的单一视角,揭示了多元观交织的战国思想图景。

第二卷《五行令》由月名图和文字组成,内容是按五行讲述四时十二月的宜忌,该宜忌在先秦至两汉时期较为流行。此卷独创性地将一年360日划分为木、火、土、金、水五段,每段72日,对应30个节气,形成与《礼记·月令》不同的历法体系,证明战国时期存在“五行时令”与“四时月令”并行的多元历法实践。

第三卷《攻守占》上文字按顺时针方向以圆圈状排列,内容是关于攻城守城的方向、日期和时辰的宜忌。《攻守占》按方位排列的军事禁忌,将星象运行与战争策略结合,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军事化应用。这种将天文学实证与哲学思辨结合的体系,比古希腊占星术更早展现出系统性科学思维。

该帛书所附的两套图,一套是彩绘的十二月神图,一套是四木图,四木居四隅,春为青木、夏为赤木、秋为白木、冬为黑木,上面标注的十二月的月名,和《尔雅》中的月名完全一致。楚帛书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

该楚帛书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特质,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国古文字、古文献以及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学界把它称作“先秦百科全书”,也将其看作“战国时期人们的生存手册”。

帛书回归有着怎样的故事

子弹库帛书生于战国,出土于战火。

战火纷飞的1942年,盗墓贼在长沙市一个子弹库的地方盗掘了一座战国古墓,发现了这件帛书。此帛书作为出土文物便也沿用此地名为其身份标识,被命名为“子弹库帛书”。

只是当时盗墓贼有限无珠视其为一块“破



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交接仪式上拍摄的子弹库帛书。
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抹布”,在出售其他所盗文物时将之免费送给了文物贩子。所幸,这块“破抹布”被文物修复专家、收藏家蔡季襄慧眼识珠购得。精心修复后,为了更清晰地研究帛书上的文字,1946年蔡季襄求助当时在中国有多重身份的美国汉学家柯强,请他用红外线相机拍照。而柯强却秘密将该帛书送至美国,帛书一去就是近八十年。

从出土开始,子弹库帛书的命运就带上了传奇色彩——贱送、被骗、流失出国、部分回家。这份流落异乡的“战国孤本”,被分为两部分,辗转流离,曾被私人购得,第一卷最终被美国赛克勒基金会收藏,第二卷、第三卷被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人

员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并将当年被迫和柯强签订的契约上交给湖南省文化厅。1982年,时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20世纪80年代中叶,高至喜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相关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追回楚帛书。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历来是一个国际性难题。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提出解决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原创性中国方案。该建议书获得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响应。2024年4月,国家文

物局正式启动对《五行令》《攻守占》的追索工作。基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的扎实、完整的证据链,以及以文物回归纠正历史错误、推动双方在专业领域的长期合作这一共识,经过多轮磋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将该帛书第二卷和第三卷退出馆藏并返还中国。

子弹库帛书归国的意义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印证出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明探索无国界,但历史文物有祖国。国宝文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文脉传承,这正是我们执著于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原因。面对追索返还的国际性难题,从地方到中央,从个人到集体,持续追踪、接续努力、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漫长的追索努力,反映的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子弹库帛书的回归,成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契机。

作为“古书之首”,子弹库帛书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战国时期的文献空白。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比家喻户晓的汉朝马王堆帛书早200年。该帛书被学界称为中国神话、天文学、创世神话、艺术史以及古文字与丝织品的“活化石”,它也是中国最早的带有数学性质的特殊作品,对于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国古文字、古文献以及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重新解读先秦文明的大门。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带来了可供借鉴的文物保护、交流与合作的新范式。红外扫描、同位素检测等技术在子弹库帛书上的应用,开创了文物研究新范式,成为科技考古范例。而其流失与追索推动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清单》的制定,成为文物主权意识觉醒的标志。子弹库帛书的回归是中国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启动主动追索的生动案例,而且是以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的成功案例。以文物回归纠正历史错误、推动双方在专业领域长期合作的中国方案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也是我们提升文化阐释话语权的重要契机。以往文物的流失,不仅是文化的损失,更是文化解释权和历史话语权的缺失。帛书回归,但回归只是起点,更关键的是如何更好地提升文化话语权。这就需要深化对楚帛书的研究,从我们自身文化的逻辑出发,深入挖掘、解读其承载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更好地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历程,既是一部文物追索史,更是一部文化自觉自信的史诗。相信,子弹库帛书第一卷的回归不会久远。期待我们被劫掠和流失在海外的文化瑰宝最终都能回家!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新”与“心”的博弈:

警惕人工智能时代写作的“新八股”

■ 田宇

今年春节前夕,DeepSeek-R1以超低的推理成本和对标OpenAI的优越性能火爆出圈。一时间,这股专注于“深度求索”的“东方神秘力量”引发了本地化部署的热潮,其开源模式加速了教育、医疗、金融、政务等领域的AI应用与迭代。这不仅展示出人工智能的加速演化,而且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创设了不寻常的智能场景。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和深度学习算法的不断精进,推动了生成式AI技术广泛应用。

不同于传统的检索式AI,生成式AI能够围绕提示词,通过学习已有海量数据,模仿人类创作模式输出作品。其典型应用场景便是文本写作,使用者借助AI快速生成文章框架,通过投喂历史文本调适写作风格,根据条件预设激活特定领域的“专家”系统。因此,生成式AI逐渐成为辅助高校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神器”、科研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的“利器”、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助攻”、企事业单位从业者进行公文写作的“助手”。然而,当机械编码痕迹明显的各类文案泛滥时,“AI味儿太浓”的抱怨和“写作要去AI化”的呼声甚嚣尘上。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时代写作中“新”与“心”的博弈,或者说是新兴技术的“非人化”与思维创造的“属人性”之间的张力。

遏制人工智能写作的弊端,关键要回归对写作目的、方法、手段的探讨,即因何而写的价值反思、以何来写的方法探源、如何去写的形式表达。

价值反思:以人为主体的,实现叙事逻辑与思想情感的共鸣

当各类文本可“一键生成”,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写作的主体到底是谁。生成式AI能较大程度上完成自动摘要、会议纪要、文献综述等写作任务,甚至能够自动完成创意性文本,某些方面编写能力明显优于常人。但是,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以人为范本对机器思考处理问题模式的规划,依托的海量素材是人已有的创造,写作从发起、生成、优化到结束都由人来驾驭,人的真实需求始终是衡量AI写作的价值标准,否则自动生成的文本只是文字废料。

面对以算法技术为支撑的生成式AI编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写作的价值尺度该如何定义。写作价值包括凝结在文本中的人类劳动,以及文本的功能和属性对这一主体需求的意义关系。一方面,支撑生成式AI系统的推理模型的建构和算法的设计训练等凝结人类劳动,其写作价值由人类劳动价值来规定。另一方面,应用写作和文学创作两种

基础写作类型均包含事实的陈述、逻辑的建构、情感的表达和思想的萌发。生成式AI编写的内在逻辑是算法技术,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对大规模信息的处理,以完成指令任务为目标,建构的逻辑由人类真实在场写作的大数据生成,仅停留在对文本归纳整合的浅表层面。这种对已有信息的编码并不能形成新的知识,也就是将写作中新思想的萌发、深层逻辑的把握排除在外。同时,生成式AI完全不同于人,不具备人的心智和生命体征,因而生成式AI编写无法观照人类的情感表达。即便在事实陈述层面,生成式AI欠缺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面临着问题意识弱、实效性差、细节失真、价值误导等挑战,文献来源的真实性、数据分析的科学性等备受质疑。

方法探源:以素养为基石,推动有效阅读与知识积累的共振

适逢毕业季,一些高校学生毕业论文过度依赖AI或极具伪装性的AI代写让人担忧。表面来看,可归结于学生学习态度和学术诚信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学生对专业理论的学习

不够,对基础知识的把握不足,尚未形成内化于自身的认知结构,致使写作时无法调动相应的知识单元。政务领域,AI编写提高了公文处理效率,也滋生了文字冗余、语言风格整齐划一、鲜活案例真假难辨、行文漂亮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等弊端,形成知识获取加速与知识增量受限的悖论。或许可以说,用户可以用贴近人工智能的语言对其进行驯化,提升文本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准确提问和发送指令同样离不开对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

由此看来,生成式AI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将人的深度学习让位于机器,或将认知过程长期“外包”给人工智能。提升AI编写水平、避免质量失准的通病,关键在于人能否推动有效阅读和知识积累的共振。此有效阅读并非作为数理逻辑产物、缺乏个体感悟等偶然性内容的人工智能阅读,而是一种既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读深、读厚、读透作品,又能够通过个体精神劳动将外在知识内化于心,对其进行再认识、再解释、再建构,促进个体与社会双重发展的阅读。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知识的积累,达到人驾驭生成式AI能力的跃迁。

形式表达:以务实为要义,确立辞达立本与风骨铸魂的共识

一些AI生成的文章经不起推敲:大致一看,标题醒目、框架合理、用语规范;仔细品味,语意不详、词句断裂、逻辑跳跃,一股拙劣的拼凑感扑面而来。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将“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的文章定义为“党八股”,认为其是形式主义的表现,旗帜鲜明予以反对。现如今,一些AI生成的文本因充斥着规范而僵化、华丽而空洞,看似一本正经却让人不知所云的字眼而被称为“新八股”。

“新八股”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无的放矢、言之无物、装腔作势。纠正这种不良文风,一要秉持“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的准则,延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风格,确立辞达立本与风骨铸魂的共识;二是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走进基层,找准问题、摸清原因、提实对策,以转作风带动改文风。【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思政专项(hnsz2023-19)阶段性成果】

前不久,我们刚刚告别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6月中旬,我们还将迎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样的节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博物馆里的文物,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则恰似流淌在岁月长河中的文化基因,在匠人手中代代相传。当尘封千年的文物与鲜活灵动的非遗相遇,这既是古老文明跨越时空的隔空对话,更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化共鸣,为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文化遗产涵盖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视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诸如传统口头文学及其语言载体、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和节庆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而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含不可移动文物,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以及可移动文物,如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还有在建筑式样、分布形态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犹如手心与手背,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其中,文脉是文化遗产的“灵魂”,决定其文化意义;文象则是文化遗产的“躯体”,承载其存在形式。系统性保护需兼顾二者,相得益彰:在修复古建筑(文象)时,需深入挖掘其历史功能与社会背景(文脉);在传承非遗技艺(文象)时,需悉心维护其背后的信仰体系与社区纽带(文脉)。文物与非遗的“双向奔赴”,正是“文象”与“文脉”的合一融通。

然而,在博物馆里,静静陈列在展柜中的民族文物,无论是可移动文物,如黎锦、树皮布、骨器、黎陶、黎族服饰、黎族剪纸、藤竹编等,还是散落在黎寨的不可移动文物,像船型屋等,皆以文字、图片等方式为切口,深入阐释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但是,在传统的讲解模式下,讲解员滔滔不绝地输出知识,观众大多是单向接受,常常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一挥手,仅带走购买的文创产品,文化体验流于表面消费。这显然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推动非遗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其实,非遗技艺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态展示已经为讲好民族文物故事开辟了新途径。

比如,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黎族传统纺织刺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席地而坐,将织机绕于腰间,双脚踩住经线木棍,提经投纬来回穿梭。只见她指尖翻飞,彩线在腰织机上穿梭跳跃。黎族织锦以其独特的纺、染、织、绣工艺闻名遐迩,每一块黎锦上的图案都蕴含着特定而丰富的含义,或为黎族的图腾崇拜,或为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刘香兰一边熟练地操作织机,一边热情又耐心地向观众介绍织锦技艺的要点和背后深邃的文化寓意,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在当代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现场观众既能观赏藏品,又能亲手触摸纺织工具,不由惊讶于看似简单的工具竟能织出如此精美复杂的织锦。

同样,对于文物的了解也需要非遗技艺的助力,比如,黎族钻木取火工具静卧于展柜之中,若无活态传承的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仅凭燃人氏神话的描述以及考古发现,观众对其使用方法的了解就会很有限。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堪称远古技术的“活化石”,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具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钻木取火器高度相似,无论是钻木板与钻杆的组合,还是借摩擦生热原理实现取火,抑或芯绒引燃物的使用等,均证明了该技术广泛的传播范围与顽强持久的生命力。至今,在海南黎族聚居区,这项技艺仍得以保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照良通过实践,将上古智慧延续至今,成为研究史前技术演变的珍贵“活样本”。

在黎族文化中,钻木取火不仅是一项关乎生存的实用技能,在黎族制陶仪式上,以此法点火,更是一种对祖先的虔诚敬畏的表达。同样,在中华文化里,燃人氏被尊奉为“火祖”,其传说早已化作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彰显了火在中华文化中的启蒙与开创意义。保护黎族钻木取火技艺,进一步凸显了火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纽带作用,这既是对远古智慧的崇高致敬,也是对未来文化多样性的坚定承诺。

从黎锦到黎族钻木取火工具,文物与非遗的对话深邃而韵味悠长。这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不仅助力传统文化从博物馆走向社会大众,也为非遗技艺注入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通过这样的交流与分享,能够引导人们更加珍视身边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让博物馆真正肩负起传统文化守护者与传播者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携手共进,深入挖掘文物价值,精准阐释其内涵,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在传承与创新的征程中,续写文物与非遗相互成就、交相辉映的新篇章,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作者系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推动文物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 陈佩

思想漫谈